

我父亲和书

周 珏 良

我父亲周叔弢于1984年2月14日以九十三高龄不幸因病逝世。他身后党和人民对他做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的评价，并给他很高的荣誉。他在解放前后发展民族工业和解放后参加人民政权所作的工作已见《人民日报》1984年2月26日发表的“生平事迹”。关于他一生搜集善本书和文物捐献给国家的事迹，在他身前身后也已有许多文章记述。但对他藏书旨趣和其中甘苦，有许多方面恐怕尚不为人所知。这篇文章想就我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一来是纪念往者，二来也希望对来者不无益处。

我父亲从十六岁住在扬州时起就受家庭的影响开始买书。当时我祖父周学海（光绪壬辰科进士）在南京做候补道，而家住在扬州，每次回家必带一大批书回来，这给他很深的印象。他最初是根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买一些研究旧学的实用书籍。后来无意中得到一部日本印本莫友芝所著《即亭知见传本书目》里面记载了许多宋、元、明刻本和旧抄本书，并常常评其优劣，这才开始注意善本。1914年从青岛移居天津之后，以廉价买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是收藏宋本的开始，曾取“拾寒堂”（后来又用过“寒在堂”）的斋名以作纪念。以后若干年中他对善本书续有所得，而质量和数量提高增加最快的则是二十年代末期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由其后人运到天津之后。在杨氏后人第一批卖出的书里，他从天津文友堂书商魏子

敏手里买到宋湖北刻本《南华真经注》，是他得到海源阁藏书之始。接着他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杨氏后人杨敬夫，可以直接从他手中买书，头一部是宋版《新序》，时间在1931年以前，以后陆续从杨氏后人和其他途经买到海源阁藏书共五十五种，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前买的，最后一种则是1948年收得的元雪窗书院本《尔雅》。这一批书都是海源阁藏书中的精品，使“自庄严堪”（我父亲藏书斋名）善本书藏大大生色。

我父亲和书的关系我想可以归为三句话：苦心收书；一心爱书；热心献书。他收书之苦心可以用他九十岁那年（1980年）为他1942年手订的善本书目所写的题识上的一句话表达：“此目写于三十年前。一生精力聚于斯。”这话初看上去似乎是泛泛而谈，但是其中甘苦却有许多难为不知者道的。在抗日战争前他经营工厂，收入是不少的，但是善本书价钱之高也使他常常要费力才能得到。宋元本书一部动辄要几百上千乃至几千元。他在1933年买宋刻汤汉注的《陶靖节先生诗注》两本书就用了四千元，是并了债买的。在抗日战争前夕，他经营的工厂都被日帝国主义者强吞以去，收入大为减少。1936年丙子元宵节时，他在自己记载所买古书文物的册子上写道：“负债巨万尚有力收书邪？姑立此簿，已迟往昔半月之期矣”。^①到了那年除夕他又记道：“今年财力不足以收书，然仍费五千七百余元，结习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书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给值稍昂耳。”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于1939年己卯岁末又写道：“今年本无力收书，乃春初遇陆监（指金代张氏晦明轩刊本《通鉴节要》），毛诗（指宋监本《毛诗》），岁暮遇《衍约说》（宋本），《蜕庵集》（指陆其清手抄，王闻远、黄尧圃校跋本）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1942年壬午他因家用不足，忍痛割爱，卖出明本书一百数十种，得了一万多元。这时有北平的书商从上海买到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带到天津给他看，他见这书刻工印刷都十分精美，毅然

以一万元高价买了下来，在书后跋语中说：“昔人割庄易《汉书》之举或尚不足以方余痴；而支圃山人‘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弗较’之言，实可谓先获我心”。在同年岁暮，又在购书册中记道：

“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矣。”从以上这几件事中很可看出他收书的苦心。

他之所以能如此竭尽全力收书和他的酷爱书是分不开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他藏书有“五好”的标准。所谓“五好”就是：一、版刻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纸张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题跋好，等于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装潢好，象一个人衣冠整齐。在这里他以人喻书，讲得十分生动。但这不止于是比喻，他对于书的爱护，也确有把书当人对待的味道。他常常用“蹂躏”这类字眼来形容看好书不仔细而损伤了书的行为。对于看书不知爱护的人，那怕是至好的朋友也不愿把书给他看。好书得到后，装潢好的就照原样保存，如有破损或装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补缀、重装，然后用樟木夹板，楠木书匣装起，再摆进樟木或楠木书箱里保存。用他常说的话：这样才“对得起”好书。他自己看善本书也要把书桌擦净，把书打开平放在桌上，或者以一手轻托书背，端坐来看。我们这些子女很小时就听他讲赵松雪看书要“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的规矩，并要求我们遵守。他常说看见有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给书上留下很深的一道痕迹，再也消失不了，真有“切肤”之痛。他对有些藏书家在书上打坏图章十分讨厌，自己用印也十分慎重。他早年用过一方长方阳文的“曾在周叔弢处”的图章，后来在善本书上就只用一枚方形，“周暹”两字白文小印^②，是童大年（心厂）刻的。他说选用这方印到不是因为它特别好，而是因为它小，如果后来的人觉得讨厌，可以挖去，不至损书过甚。他藏书的斋名很多，也请名手刻

了很多印，如“寒在堂”（指宋本《寒山子诗》），“半雨楼”（指宋蜀本《王摩诘集》，因为其中有“山中一半雨”之句，而后来本子都作“山中一夜雨”），“双南华馆”（指所藏两种宋本《庄子》），“东稼草堂”（指元本《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孝经一卷人家”（指元相台岳氏本《孝经》），“自庄严堪”（出自《楞严经》）；但除“自庄严堪”（有三方，各出自吴昌硕、陈师曾、童大年之手）有时还用外，其余的都不在他收藏的善本甲类书面只用在一般善本书，自己刻印的书和影印本书上。如他旧藏的元本《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影印本出版后，在他给我的一部上才打上“东稼草堂”的章，而在两书的原本上并不用这个印。从这里可见他唯恐损书的用心。他常常恼火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时好书上盖的收藏印因印色不好而变黑。后来找出了一个法子，就是用双氧水在变色的印记上涂一层，乾后能恢复红色。他用这个法子为许多好书除去污点，十分高兴。他自己用印泥也十分审慎，唯恐打在书上渗油或变色，损坏书籍。数十年来他在善本书上钤印用的是他二十几岁在上海西泠印社买的印泥，因为经过半个多世纪试验，它不变色，也不渗油。以后他虽然买过许多种高价的印泥，但因未经试验，始终不敢用在好书上。关于他藏书爱书的情况，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在给“自庄严堪勘书图”所作的序上有一段传神的描述：

顾君之收书也，与恒人异趣。好尚虽挚而悬格特严。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务求其精湛；尤重昔贤之题识与传授之渊源。又其书必为经子古书，大家名著，可以裨学术，供循诵者。至钞校之书，审为流传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迹，必精心研考以定其真贋。不幸有俗书恶印，点污涂抹之累，则宁从割舍，不予滥收。设遇铭心绝品，孤行秘本，虽倾囊以偿，割庄以易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后又亟缮完补缀，存其旧装，袭以金粟之笈，盛以香楠之匣，牙签锦帙，芸芬麝馥，宝护周勤。故其藏书不侈闳富之名，而特以精严自励。有客请观，必告以澄神

端虑，静几焚香，恪守赵文敏六勿之戒。余每过津门，辄诣君欣赏，尽出新获，以相质证。每当午窗晴旭，夜漏风清，吾两人展卷细读，相对忘言，宛如坐澹生堂中，有缥函朱榻，风过铿然之趣。逸情高致固难为不知者道也。治事之隙，不辍丹铅。常观手校群书，皆字画端谨，朱墨鲜研，颇具义门风格，决不效茺圃之火枣糕、赤练蛇，见訾于后世也。

这篇文章是作者得意之笔，傅老先生曾风趣地向我父亲说：你这个卷子放在我这里三年，迟迟未下笔，终于有这一篇文章，也算对得起它了。

他爱书还表现在一件事上。他每见一部书因某种原因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必要千方百计，或重价收买，或把自己所藏的捐出去，以凑成全书。这样好像使一家人团圆了，他才感到舒服。举个例子说，他藏书中有两部《春秋经传集解》，一是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因有“相台岳氏”之名曾被认为是宋岳珂刻本），一是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本。1930年庚午春，他先从天津文友堂书店得到岳刻本的《春秋年表》和《名号归一图》，然后于当年在天津又得到卷十二、十三和卷廿七至卷三十，共六卷。第二年1931年辛未又得到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廿六共廿三卷，而且还是原来的装订；这时全部《春秋》三十卷已得到廿九卷。只差第一卷了。那时听到这一卷十年前被嘉定徐氏买去，他赶忙向北平去找，结果是前几天被人买去了，没有找到。后来又传闻第一卷在上海“淞沪之战”时被毁掉。他这时为了使全书不至“群龙无首”，不得已于1933年从傅沅叔先生那里买到宋抚州本《春秋》第一卷来配上。那知到了十几年之后，在1944年甲申阴历十二月廿六日听到岳刻《春秋》的第一册在北平有人拿到谢刚主先生处求售。他听到后惊喜过望，赶紧写信去问。信刚发出，谢先生已介绍藏这书的徐某于阴历十二月廿九日拿来求售，同时拿来的还有脂砚斋评《红楼梦》庚辰本。当时他不想买脂评《红楼梦》，而这《春秋》第一卷是非买不可的。最后以议价未成还给了原

主。而后在两年中时时间价。要价越来越高，终没有买成。一直到1946年丙戌阴历十二月才以一两黄金之价买到。凑成完璧之后，他在书上写了跋语，其中说：“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余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全书凑齐了，他首先是为书喜欢，可见爱书之笃。但在鹤林于氏本《春秋》上，他却不那么幸运。他先从海源阁后人处得二十三卷，又从李木斋处买到先散出去的四卷，从北平书估王晋卿处买到一卷，共二十八卷，但上海刘晦之所藏的一卷（二十六卷）则坚不肯让，所缺的另一卷（第十卷）则更不可踪迹，未能配全。所以他于1942年壬午在此书后写的跋语中说：“今刘氏书（指刘晦之藏书）散佚过半，剑合珠还之愿更不可期；得失聚散固有定数，非人力所能强，第衷心耿耿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耳。”书不能完全，他首先惋惜的也是书本身而非个人得失。他这种感情也不只表现在对自己的藏书上。1949年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时，他听到当时存在故宫博物院中的一部宋本《经典释文》（后拨归北京图书馆）中所缺的第七卷在某书商手中，此人扬言决不卖给国家图书馆，他听了之后马上以重价买下，捐给故宫。这是他第一次捐书，他或许也是新中国捐献文物的第一人，目的还是一样，使失群之书得以重聚。有一回他听到北京图书馆中所缺的鹤林于氏本《春秋》第二十六卷在解放后已归上海图书馆，就在开会时，给陈毅同志写了一个条子，要求他支持，使这部书“重圆”。陈毅同志马上答覆，要上海把书拨来。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样关心文化，十分感动，常常把这件事说给我们听。十年浩劫后，他在天津新华书店发现一本宋刻《春秋繁露》，是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一部中的一册，就急忙居中说合，终于使这本书回到北京图书馆，凑成完璧。

他对流传有绪的书更特别注意其完整，不使失群。如黄尧圃得到汲古阁旧藏宋本《陶渊明集》和宋本汤汉注陶诗曾取斋名叫

“陶陶室”，后来两书都藏在海源阁杨家。杨家藏书散出后，他先得到《陶渊明集》，为了使两陶集不至失散，如上面所说，他不惜以重价从居奇的书商手里把汤注陶诗买下来。后来更因为当年黄尧圃曾以宋刻施注苏东坡集中的和陶诗二卷和两部陶集都放在“陶陶室”中^③，所以又向杨氏后人买下了这两本苏诗，使这三种书分而复合。

对于流出国外的善本书，他总是竭力赎回。抗日战争前，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从我国买去一批善本古籍。他得知后，以大价收回了宋本《东观余论》、宋本《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当时还有一部宋本《通典》，索价万圆，一时筹款不及，后来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国宝”不准出口，无法买回。这件事他多年之后提起还遗憾不止。

他对好书之不完全者又常常请人精心抄配以成全璧。如他购自海源阁的《兰亭续考》写刻极精而只有半部。他就请他的好友劳笃文（名健，浙江桐乡人，劳乃宣之子，精书法，行楷书，特别是小楷书之妙为近百年来所仅有）用精楷写了半部，配成全书。

他苦心收书，一生所得精品甚多，突出的有宋婺州本《周礼郑氏注》，宋建本余仁仲万卷堂本《礼记》，宋本《三礼图》，宋湖北刻本《建康实录》，宋本《新序》，宋湖北本《南华真经注》，宋本《清波杂志》，宋本《陶渊明集》，宋本汤注《陶靖节先生诗注》，宋蜀本《王摩诘集》，宋本《花间集》，宋蜀本《二百家名贤文粹》等。金本则有《庄子全解》，《通鑑节要》。元本有延祐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大德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梅花百咏》，《梅花字字香》等。明板有洪武本《姑苏杂咏》，洪武本《傅与砺集》，兰雪堂活字本《春秋繁露》，建业张氏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宏治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等。抄本有宋抄本《宝刻丛编》，元抄本《简斋诗外集》，明吴宽手抄本《山海经》，史臣载手抄本《贞白陶先生文集》，朱存

理手稿本《珊瑚木难》，钱谷手抄本《游志续篇》，和汲古阁毛氏影宋抄本《东家杂记》，《酒边词》，《圣宋高僧诗选》等。所藏《永乐大典》三卷中有《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书。还有清代王乃昭、鲍以文、金侃、张充之、翁杖、吕无党诸人手抄本书籍。校本除黄尧圃校跋本数十种外，其他有钱牧斋、钱遵王、毛斧季、叶石君、周香严、顾千里、劳巽卿、翁覃溪、吴牧庵、鲍以文等手校书。1952年他捐书时，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写信给他，对这批书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之评。

因为他如此爱书，他也常常把善本书影印，翻刻出来，使它化身千百，可以流传更广。他用木版和珂罗版等影印的书有十几种，其中突出的如下：

宋书棚本《鱼玄机诗》。此书是黄尧圃旧藏，十分珍重，曾请余集在书前画鱼玄机小像，并广征题咏。民国后这本书藏在袁寒云（克文）处，是他的“后百宋一厘”中的精品，曾由他的夫人刘梅真亲自影抄一部。这部书有一个时期曾抵押在我四叔周季木那里。我父亲很喜欢这部书，就把它影印出来。当时是在天津一家技术很高明的日本山本照像馆照成玻璃版，然后寄到日本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是他自庄严堪影印书的第一品。此书印数不多，他十分珍惜，不轻赠人，流传绝少。解放之后，这本书的原本由上海潘氏宝礼堂后人捐入北京图书馆。我父亲去看书，见收藏者不知宝爱，书上有许多指痕，甚至茶污。这书是裱成摺本的，黄尧圃原来的楠木夹板竟有了裂痕。他回来之后十分感叹地说，这本书几十年不见，今日重逢，真有佳人迟暮之感，影印本恐怕比真本还漂亮了。

宋本《寒山子诗》，如前所述，这是我父亲很早就买到的书。他于1924年甲子托董康在上海用木刻影印，纸墨均精。其中有用开化纸印的，只有几部。

元相台岳氏本《孝经》，这也是他很早得到的一部善本书。最初是用珂罗版影印，乾隆五玺和收藏印都用红色套印，并且用了不同的纸张，其中最名贵的是乾隆高丽纸。后来又有木刻影印本。

宋书棚本《宣和宫词》附三家宫词。用珂罗版印二百部，其中有有用明朝纸影印的四部。

此外还有影印本《庐山复教集》，《寒云所藏宋本提要》（袁寒云手迹），刻印本《屈原赋注》，《九僧诗》，《十经斋集》等。

他对于古书之流通不止于自己刻印，而是有机会就向有关方面加以提倡。开国之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就和徐森玉、赵万里两位先生提案建议如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印行《续古逸丛书》之例，影印善本古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多年来他不断提起此事，感到遗憾。近年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印行《古逸丛书三编》，李一氓同志要我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非常高兴，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对入选的书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曾在《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第107期上发表。他旧藏的宋蜀本《王摩诘集》影印本于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他在我藏的一部上写了一个书跋：

宋蜀小字本《王摩诘文集》十卷，汲古阁旧藏，有宋本甲印可证。“二泉主人”，“听松风处”亦毛氏印。独无毛氏姓名印为可异。此书自艺芸书舍归海源阁杨氏后秘藏逾百余年。曩因世变，杨敬夫携阁书至天津，余颇有所得，独此书商之经年乃蒙割爱。得书之日，欢喜无量。一九五二年余举藏书归之北京图书馆，幸余书之得所。今于珏良家见此影本，如晤故人，数十年前光景恍然在目。国家重视文物，化身千百，佳惠士林，可为此书庆。我一人欣然欢呼，乌足以尽之。

他自己也买了一部，随时翻阅，并高兴地说：原书在手时，舍不得翻阅，现在只有影本，反而可以看了。

他旧藏元大德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先有石印影本，后

来于1974年上海书画社又依此本，并参照四印斋翻元本以木刻影印出版。他看到之后觉得刻工印刷十分精美，买了一部，给我写信说，看见此书“眼馋”，不得不买，并写了一篇小记：

雕版印刷是我国流通书籍所用之传统方法。始于隋唐，盛于赵宋，元明以降至清末而渐衰。辛亥革命以后，南北藏书家曾提倡仿刻宋元，其他诸书仍沿用横细直粗所谓宋体字，不脱刘文奎、刘文模之规模。今见此书秀丽精美，直欲上继康熙时扬州诗局之遗风，不禁惊喜。惜仍承袭轻视劳动人民之旧习，不著书手刻工姓名。因函询顾君起潜，请示其详。旋得复书，录示书手刻工姓名，并告我刻书原委。上海书画社前身是朵云轩，曾感木刻书籍之技术已将告绝，因访求老工人并招集知识青年加以训练，数年之久，乃有此成绩。后因主其事者以无利可图，遂解散此机构。中国雕版一线之传不得复苏，殊可惋惜。兹录书手刻工姓名于书端，以张其艺术之精湛，后之读是书者或不以我为多事而笑我也。一九八〇年三月弢翁记，时年九十。

书手 李成勋

刻工 罗旭浩 古晓堤 王健伟 徐敏 褚家琦 顾惠华 李华
古春琴 戎英 金青云 祝君波 茅子良

修字 周树根

拉线 夏宏泰

去年十二月他已在重病之中，但听到了宋本《金石录》影印出版，还十分高兴地问我看见了没有，印得如何？又听到他旧藏的宋池州刻本《山海经》也将影印，还说出版了一定去买一部，真是爱书之志始终不渝了。

清代洪亮吉曾经说藏书家有五等^④，谢刚主先生为《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作序时曾因洪氏之说写道：“公之于学兼通目录，于校讐赏鉴之事，兼而有之。”我父亲手校的书数十种，大都捐入天津图书馆。他校书非常仔细，总用好硃墨写秀丽端谨的小楷，从不随意涂抹。诚如前引的傅沅叔先生勘书图序中所说，颇有清代何焯（义门）校书的风格。至于赏鉴则上文所述已多，他是能

力极高，又极严格的。自来鉴藏家对自己的藏品往往有所偏爱，评价因之未必客观，甚至于认为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而他恰恰相反，对自己的藏品，那怕是用大价收进的，也要反复严格鉴定，弄清真相，决不含糊。例如在1952年捐献善本时，他曾把善本书分成甲、乙两编，当时赵万里先生看过后，曾提议把原来归入乙编的十余种书提到甲篇里来，可见他悬格之高，标准之严。还有一事更值得一提。1941年辛巳在天津出现了一批颇像从燉煌出来的草书帖，书籍（如《论语》），文书等等，往往还有李木斋的收藏印。他当时用大价钱买了近十种。后来仔细研究，看出是双钩伪制，并请赵万里先生看过，也认为不真。在看准了之后，他毫不犹豫，说这种东西不可留在世上骗人，就一火焚之，费了多少钱毫不顾惜^⑤。1936年丙子，他曾从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那里买了一本宋贾官人刻的《文殊指南图赞》，当时以为是真宋本，后来看到日本影印的另一本，认为这是元明间日本翻刻本，曾写信给田中，说书已买来，不想向他退换，但希望他说明一下这一本是日本何时所翻刻。田中回信仍坚持说这本书是宋刻。就是这样，他仍把这书排除在善本甲乙编之外。对鉴定的事，若少有疑惑他是宁严勿宽，毫不假借的。

我父亲藏书虽然基本继承了传统的路子，注重宋、元、明刻和名人抄校本，并注意板刻、纸张、收藏等，如前所述有“五好”的标准。但他并不受前人的囚囿。例如他很注意对书的纸张的研究，认为是鉴别书的年代的一个重要因素。晚年很注意开化（花）纸的沿革，在请康熙年间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集》前曾写一小记如下：

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用开花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

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一九八二年八月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他在去年年底入医院前还谈到，有功夫要到天津图书馆去看开化纸的书以进一步印证他的想法。可惜他已经来不及做，只能留待后人了。

他的藏书能自辟途径，还表现在他重视清朝刻本上。他在1966年为一些青年图书馆工作者讲版本知识的演讲中曾说：

清代刻书，数量既多，质量亦高，特点是软体字刻本许多是名家手写上版，运刀如笔，不失原意。软体字刻本盛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高度熟练的技术。嘉庆时则多宋体字刻本，方整中有生动之意，并不板滞，和明末刻本有所不同。活字本有两大钜刻：《图书集成》用铜活字（雍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用木活字（乾隆）。私家活字本除铜活字、木活字外还有泥活字，有李瑶（1832年）、翟金生（1844年）两家，距宋庆历毕昇用泥活字约八百年。仿宋元刻本盛于嘉庆、道光时，受黄丕烈、顾千里的影响。道光以后精刻本甚少。仿宋元本之风气，由光绪、宣统至民国初年刘士珩、徐乃昌、缪荃孙、吴昌绶、董康、陶湘等继起，稍振遗风，而以董康所刻书纸印最精。版画不及明代之多，刀法亦不及明代之婉丽遒劲。但殿版多钜制，刀法明净，颇能写实，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套印书在清初殿本中有五色本，鲜美悦目，但数量不多。民间无五色套印本。清代丛书之多亦前代所未有。《通志堂经解》是第一部大书。各省的官书局刻书是晚清时特点。刻书地点，清初有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苏州。后期有北京和各地官书局。

由此可见他对清刻本是很注意的。他晚年尤其注意传统雕版艺术的存亡。前面谈到的他对上海刻的《稼轩长短句》的赞赏是一例。还有我前年去扬州曾参观广陵古籍刻印社，看到那里除用旧版印书外，在写、刻方面都有年轻的接班人，回来和他谈起，他非

常高兴这门传统的艺术可以流传下去。

解放后，他把宋、元、明抄、校的善本都捐给国家之后，曾收集清朝的活字本书，认为在西洋铅印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活字印刷有很长历史，不可令其湮没。搜集到一千多种，就遇上十年浩劫，他无法再收，幸而已收到的都保存了下来，也献给公家，保存了一大批研究我国印刷史的宝贵资料。

他买书给价公允，遇到真正心爱的书更不惜高价，有时明知书商居奇，他也不计较。他不喜欢巧取豪夺，就是卖方对书的价值估计不够时，他也总是以公平价格收买。海源阁藏书中有一部黄尧圃旧藏的明建业张氏铜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他向杨氏后人买别的书时曾提起这本书，对方说：“这本书不怎么好，可以送你”。他忙说：“这怎么可以。”结果对方虽说是赠送，他还是依值送了对方一笔钱才把书拿来。

他既然如此爱书，又花了那么大精力去搜求，为什么说捐出去就全部捐出，一点也不留呢？这和他藏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我们从小就看他买书、爱书，但从未感觉到，也从未听他说过这些书要传给我们“子孙永保”，相反，倒常听他说他自信懂得爱惜书，书在他这里很“享福”，将来也要给书找一个“享福”的去处，以作归宿。这也就是说他藏书不止是爱好，还有更深的用意，就是保存民族的珍贵文物，不至因水火兵虫之劫，化为云烟，更不要流落海外，为他人所得。1942年，他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再收善本书恐怕不易，曾在手订的书目上记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一个“天下公物”，一个“不负此书”，这就是他藏书的最终目的。在写以上的嘱咐时，他当然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四海澄清，宇内无事”。但全国解放之后，他看到了当年憧憬的全国统一安定的日子，就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于1952年把藏书中最精品宋、元、明抄、校本书七百十五种共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他曾和我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手下又有他培养出来的如冀叔英同志等，书捐到那里可谓得所，我是放心的。又曾经说：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也曾打算留一两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决心全数捐出，一本不留。郑振铎先生曾对他说：你把珍秘之书全部献出，并未保留一部，真是难得难得！可谓评价适当了。

除了1952年所捐这一批书之外，他还于1954年捐给南开大学中外文书籍三千五百多册，1955年捐给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共两万二千六百多册，1972年又捐给天津图书馆善本书籍一千八百多种九千一百多册。此外还有零星捐赠的。例如1951年曾捐给北京图书馆永乐大典一册，和上面谈到的1949年捐给故宫博物院宋本《经典释文》一册等。他一生除收藏善本书之外，还收藏古玺印和燉煌卷子，和一些名人书画，也均已捐给国家。1981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曾召开发奖大会表扬他这种爱国行为，五十年代捐书时也得到人民政府的奖状。在天津发奖大会之后，我在北京见到他，他说：开这么大的会表扬，真是“不虞之誉”，实不敢当啊？他这种把自己一生精力所聚的收藏品献之国家，毫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特殊功绩的态度是出自内心的，十分自然的。做为他的子女，我们弟兄姊妹们数十年来时时感到他这片心意。他现在逝世了，悲痛之余，我们要把他这种精神时刻铭记，永远不忘，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1984年作于北京

注

①他一般都是阴历元旦在这册子上写几句话表示一年在买书和文物上，的希望。

②他名“暹”，后来以“叔弢”字行。

③此事详见缪荃孙辑《蕙圃藏书题识》卷八。

④见《北江诗话》卷三。

⑤伪造燉煌藏品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当时天津有一陈某，听说是李木斋（盛铎）的外甥，见过李氏所藏的燉煌卷子。他颇精于书法，所以造了不少假东西卖钱。我曾见过一卷近一丈长的仿隋人写经，若不仔细看，几可乱真。在五十年代琉璃厂曾出了一节带有三国天玺年号的经疏，字体介乎隶楷之间和传世的晋人写本《三国志》等书体相似，但仔细看来未免作意太过，不像抄书人的手笔。后来请先叔叔迦先生看过，说这是把三种后来的经疏凑起来造的，不可能是三国时人的手笔。现在流传到海外的所谓索纁写本《道德经》，从字迹上看来，也很可能出自此君之手。故扬州名士方地山（尔谦，别号大方）先生曾说：“唐人写经是抄书，不是临帖，如过去穷书生代人抄书院卷子，不欲过好，不得过丑。”这句话极是，写经出自经生之手，给值不高（燉煌卷子中就有经生在经尾上写自己的牢骚，抱怨给钱太少的例子），是不可能像书家那样，照艺术品的要求创造的。鉴别燉煌卷子的真伪，这是一条有用的经验。

这批东西之所以能骗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给人以假像，好像是出自李木斋家的。李氏收藏燉煌卷子很多，颇有精品，究其来历还有一段掌故，即燉煌藏品经过斯坦因、伯希和劫掠之后，当时的政府听到消息曾令甘肃省当局把剩下的东西扫数运到北京。到了之后，清点未就，被李氏、刘廷琛、何鬯威、方地山四个人打开箱子又搜刮了一遍，所以后来归公家的是劫余又劫余了。其中以李氏所得最多最好，所以说是他家的东西很易使人相信。偷燉煌卷子这件事是我小时亲耳听见方地山先生讲的。他当时说得有声有色，所以事隔多年还记得很清。